博物館與文化 第 17 期 頁 71~92（2019 年 6 月）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17 : 71~92 (June, 2019)

透過原住民博物館爭取困難遺產的公衆記憶

黃郁倫[1]

Contesting Public Memory of Difficult Heritage through Indigenous Museums

Yulun Huang

關鍵字：展覽敘事、原住民博物館、困難遺產、紀念

Keywords: exhibition narrative, indigenous museum, difficult heritage, memorial

---

[1] 本文作者爲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助理。
Curatorial research assistant,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Email: huangyulun713@gmail.com
（投稿日期：2019 年 2 月 25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 年 5 月 4 日）

摘要

強調真相還原、歷史見證與直視歷史傷痛等陳述詞彙，近年來悄然地由原住民行動者、抗爭者及研究者的陳述中，進入了原住民博物館的展覽敘事裡。本研究指出，透過原住民博物館或原住民主題展覽，以爭取觀眾對於原住民族曾經歷的難以面對的過往——所謂的困難遺產——之公眾記憶，是近年的轉變與趨勢之一。這樣的現象，零星卻不停地出現在包括臺灣在內的墾殖民國家；筆者認為此轉變與趨勢，與紀念博物館蓬勃發展所引發的焦慮有關，與記憶多向性的特質有關，也與原住民博物館發展歷程所遭遇的瓶頸有關，是原住民族為尋求實質和解而非展演和解所另闢的新途徑。不過困難遺產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它不只撩撥觀看者的情緒，也二度擾動與召喚被再現者的情感、思緒、記憶，甚至是極力抗拒的汙名認同。因此即便在博物館中，這樣的敘事策略能正視傷痛進而療癒傷痛，但仍具敏感與爭議。博物館作為實踐的場域，它的發展與變動總是回應或反映著時代思潮，而在我們所處的紀念化時代潮流下，原住民博物館或原住民主題展覽，是否因此邁入新的發展歷程與階段，是筆者所欲提出的討論。

Abstract

Emphasis on the restoration of truth, testimony and historical trauma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visible in the museum exhibit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s, especially in various settler-colonial countries including Taiwan. This paper examines this approach of contesting public memory of difficult heritage through Indigenous museums and exhibitions in Taiwan. I argue that this trend is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 through memorial museums" and "multidirectionality of memory" identified by Michael Rothberg, but also pertains to the bottlenecks Indigenous museums have encountered. Through this trend, Indigenous Peoples are expecting a real, non-preforming reconciliation. Therefore, since methods of curating Indigenous cultures have shifted in response to ideologies that change over tim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 current times of memorialization,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Indigenous museum developing and launching a new trajectory that was previously overlooked and underestimated.

一、轉變與趨勢：此起彼落的現象

2015 年 12 月加拿大人權博物館(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展出《被毯的見證》(The Witness Blanket)，這檔展覽同時也是一件大型裝置，內容是關於加拿大政府自 1883 年起對原住民實行的同化政策：寄宿學校(residential school)。展出超過八百個物件，包括服飾、照片、信件、學校及教會的建築殘骸等，其中有在遭祝融的寄宿學校遺址中找到的一隻童鞋、兩姐妹為了紀念父親及所有當時被迫離家的學校孩童所剪下的一串髮辮——父親和他的同學們在入學第一天便被迫剪去長髮；長髮從不輕易割捨，因為對原住民來說只在極度哀痛的情況下為了悼念才會斷髮，是負面的象徵、一扇通往寄宿學校醫護室的門板——生還者回憶當時對這扇門的印象是，許多生了病的同學被帶進那扇門後，就此人間蒸發再也不曾出現。

2013 年 7 月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出《訊息棒：澳洲都市原住民認同》(Message Stick: Indigenous Identity in Urban Australia)，該展由澳洲藝術銀行(Artbank Australia)在 2011 年推出後便不斷地在國際間巡迴，多幅展品赤裸裸地陳述「失竊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失竊的一代」是 1909 至 1969 年間澳洲政府對原住民實行的同化政策，強行將原住民孩童送往政府機構或白人家庭，並命令其永久性地斷絕與原生家庭的關係。策展人 Carrie Kibbler(2011)在圖錄中指出，由於二十世紀初期的同化政策，導致居住在都會區的原住民與自身傳統文化及語言的關係斷裂，這樣的現象成為都市原住民藝術的重要主題。特別是在 1980 年代初，來自不同群體，有著多元背景的一群原住民藝術家們，因同樣生於 1930、40 年代，他們共同經歷了同化、歧視的生命經驗，而在當時形成一股藝術創作的趨勢。

2016 年 9 月臺北市政府凱達格蘭文化館展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用血汗打造一個都會，把原鄉留在夢裡》，內容特別提到 1960、70 年代，高比例的原住民人口填補了臺灣經濟建設所需的勞動缺口，高風險的勞動條件以及充滿歧視與剝削的勞動環境，不斷上演在臺北都會那些指標性或無名的建築工地裡。也在 1980 年代接二連三與勞工相關的社會要聞中引發討論，

包括海山礦災、湯英伸事件、新光紡織士林廠關廠等。

圖 1　凱達格蘭文化館《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用血汗打造一個都會，把原鄉留在夢裡》展覽文宣（圖片來源／凱達格蘭文化館網站）

2018 年 2 月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出《音樂的慰藉：臺灣原住民現代歌謠中的共享記憶》，展覽入口摘要了〈流浪到臺北〉、〈白米酒〉……等歌謠詞句，接近尾聲的單元特別以一個完整個空間佈置出半封閉的礦坑意象，播放原住民音樂創作者胡德夫因 1984 年海山礦災所創作的〈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離開碧綠的田園／飄蕩在都市的邊緣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湧進昏暗的礦坑／呼吸著汗水和污氣

轟然的巨響／堵住了所有的路
洶湧的瓦斯／充滿了整個阿美族的胸膛
為什麼啊／為什麼／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找不到留在家鄉的門

此外，該展覽雖以年代為敘事軸線，但卻在多個單元中不斷反覆出現原住民離鄉勞動的聲音與身影——這些皆呼應《台北不是我的家》展覽所欲拋出的原住民勞動議題——然而《音樂的慰藉》並不侷限於勞動議題，而是希望從歌謠史來看自殖民以來的原住民歷史。策展人之一盧梅芬在開幕受採訪時坦承：「的的確確大部分的時段，壓迫和傷痛是居多的」（東海岸之聲，2018），而她希望透過歌謠反映的情感抒發，讓觀眾瞭解這樣的歷史傷痛。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強調真相還原、歷史見證與直視歷史傷痛等詞彙，近幾年進入了原住民博物館的展覽敘事及策展動機裡，這樣的現象零星卻不停地出現在上述這些，包括臺灣在內的墾殖民國家的博物館及展覽。我的研究探討此轉變與趨勢從何而來、何以至此。

本文將指出當代原住民博物館或原住民主題展覽，逐漸在爭取觀眾對於原住民族曾經歷的難以面對的過往——所謂的困難遺產——之公眾記憶；這樣的現象，我稱之為「以紀念為導向的原住民博物館」(memorial-oriented Indigenous museum)，並認為它與紀念博物館在 1990 年代後的蓬勃發展有關，與記憶多向性(multidirectional memory)的特質有關，也與原住民博物館發展歷程所遭遇的瓶頸有關。由於博物館發展變動不止，博物館在不同時代的發展策略與取向，都刻畫著該時代的獨特性，也回應或反映著該時代的思潮；因此透過本研究，我希望進一步理解當代原住民博物館的發展軌跡和趨勢。

在前言中我列出近五年內所留意到的一小部份例子，它們有些間接有些則直接地，強調原住民歷史傷痛的敘事方式。為了說明這樣的做法是近年才出現的現象，在下面的章節中，我將並置兩個美國博物館機構的今昔對比，

透過比較，將有助於我們更明顯地看出趨勢的轉變。

二、從 1976 年《神聖的圓》到 2014 年《平原印地安人》展覽

位於美國中部堪薩斯城的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在 2014 年推出《平原印地安人：土地與天空的藝術家》(The Plains Indians: Artists of Earth and Sky)，並先後巡迴至法國巴黎的布朗利碼頭博物館，以及美國東岸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該展覽集結了散落在歐洲、北美的精彩文物，包括距今 2000 年前的人偶造型石製煙斗、十八世紀的長袍、及當代設計師所創作的珠繡鞋。從展覽框架的空間及時間跨度來看，《平原印地安人》是一場極富野心的策展作品。平原印地安人分佈於美洲內陸的廣大區域，此內陸區域不論從殖民化或國家化的歷史過程來看，都是北美原住民的最後一道防線，被視為美國原住民文化相較之下較為鮮明的區域。平原印地安人的物質文化諸如圓錐型帳篷(tipi)及羽冠頭飾等，也因此成為泛北美原住民的形象。

因此，對於座落在平原印地安人領域上，幾乎是位於美國國土中心點的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推出這樣一個展覽——框架極具野心，但名稱卻流於俗套——我感到不太放心。我抱持著多疑的態度，想進一步瞭解這間博物館，卻因而將時間回溯到四十年前。

1976 年，納爾遜藝廊（Nelson Gallery，是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的前身）為了慶祝美國建國兩百年，推出大型特展《神聖的圓：兩千年來的北美印地安藝術》(Sacred Circles: 2,000 Years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 Art)，普查式地囊括了各種型式、各個區域的美國原住民藝術(Schuster, 1978:194)，北從阿拉斯加與格陵蘭，南至波多黎各；高達八百五十件的展品，來自北美、英國、歐洲等總計九十處機構及個人的收藏，且多數從未公開展示過(Coe, 1977: 124-128)。

換句話說，同一機構，時隔四十年的兩個策展作品，在展覽框架的空間

及時間跨度上，如此同出一轍。甚至端出同一件文物：一件木雕馬匹，特別點名為不可錯過的重點展件。然而若比較 1976 及 2014 年策展人對此件展品的描述，我很快發現它們之間有著明顯差異：

> 【1976 年】這件帶傷馬匹的雕刻，在平原印地安人的藝術中極為獨特，是目前所知唯一的馬的雕刻，並且是極佳的傑作。牠躍動的姿態，細長的身形，帶出一種超然的質地。以馬毛製作的馬尾，以及皮革材質的韁繩所呈現的線條，賦予了馬匹向前的律動感。(Hoare & Coe eds., 1977: 168)

> 【2014 年】十個紅色三角形代表的，是這隻向前衝的馬匹，在牠生命的最後一刻所受的傷，流的血。這件作品，被認為是由知名藝術家暨退役戰士 Joseph No Two Horns 所創作，是平原印地安雕刻中，廣為人們熟知並受到讚揚的作品。過去，戰勝的勇士們會與像這樣的馬匹塑像共舞，藉此榮耀他們的動物夥伴。

身為觀眾，我接收到不完全相同的資訊，1976 年策展人把重點放在藝術表現與賞析，2014 年策展人則把焦點聚焦在戰爭與勇士。1976 年當時一則展覽評論說：

> 最令人屏息讚賞的作品是這件百年前平原印地安人的木雕馬匹，策展人 Coe 在展覽中寫道：「可能我們都有些訝異，但不得不承認美洲原住民藝術家過去是，現在也是，如此技藝高超的雕刻師、設計師與匠師。」Coe 以這件展品提醒了我們，長久以來對於印地安藝術的忽略。(Unknown, 1977: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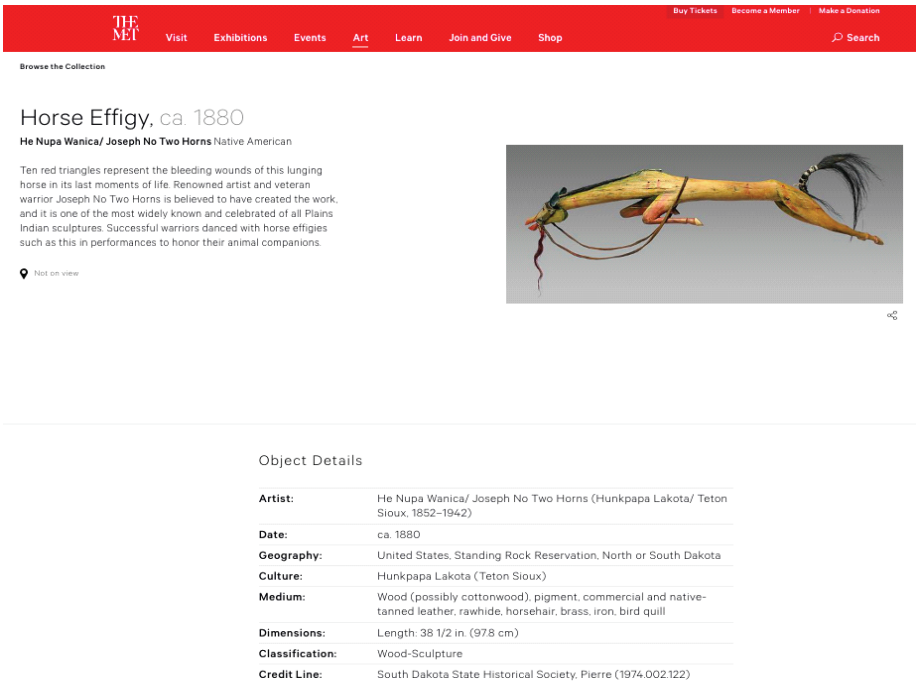

圖 2　分別在 1976 年《神聖的圓：兩千年來的北美印地安藝術》及 2014 年《平原印地安人：土地與天空的藝術家》都被視為重點展品的木雕馬匹（圖片來源／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網站）

然而這樣的敘事邏輯也招致批評，在另一則評論中我們可以讀到不一樣的觀點：

> 坦白說我看完《神聖的圓》之後感到氣憤與受傷。這麼一檔原住民界的盛事，發生在如此關鍵的年代，觀眾中極有可能有許多具有同理心的潛在公民，展覽卻對於印地安人的政治現況隻字未提——這是罪犯的行為。也許吧，現在的藝術展覽本來就沒有責任要去回應社會、文化、歷史的觀點；也許吧，事實是博物館從來就不是那麼有效的教育機構。(Levine, 1978: 110)

相較之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在 2014 年的《平原印地安人》採取了不一樣的敘事策略，在入口展板就開宗明義地定調，這個名為藝術的展覽，是回應歷史的：

> 平原印地安人的故事，是一篇有關生存、適應，與反映著失去、不屈不撓、再生的故事……當平原的生活因殖民而不得不作出回應與轉變，藝術家則持續將支撐、引導、組織著人們的信仰，體現在作品上。與此同時，新的形式與意涵也被創造出來。

呼應入口展板，《平原印地安人》的單元是按照歷史時代區分的，共分為七個展區：

(1) 遠古的人民

(2) 大平原上的生活 1700-1820

(3) 危險時代的繁盛 1820-1860

(4) 水牛之死 1860-1880

(5) 保留區的早期生活 1880-1910

(6) 保留區與都市生活 1910-1965

(7) 當代藝術復興 1965-2015

每個單元主題不僅點出年代，也從殖民過程的角度為各個年代定義。例如「危險時代的繁盛 1820-1860」講述的是馬匹被殖民者大量引進後，平原印地安人家家戶戶都因此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性——移動上的便利，因騎馬而帶來水牛獵捕的大豐收，因而能透過水牛再交換更多的生活用具與武器；然而這樣表面上的繁盛與富裕，卻埋下了日後的危機，導向部族之間的衝突以及水牛的終結。

另一方面，《平原印地安人》在展覽空間設計上，也局部呼應了同樣的敘事策略。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巡迴展出時，其中一件衣飾展品被獨立出來，被擺置在一個難以忽視的空間，陳列在展場中央特別打造出來的半封閉的圓形空間內。這是「鬼舞」（ghost dance）的儀式服裝，在圓形空間內的展品描述向觀眾說明了何謂鬼舞。鬼舞是 1890 至 1900 之間在平原印地安人之中出現的宗教運動，那是對美洲原住民而言最糟的時代，因此有宗教領袖提出透過鬼舞這樣的儀式，世界將返回和平，死者將重生，傷痛將癒合。

綜上所述，2014 年《平原印地安人》的敘事方式，是在 1976 年《神聖的圓》所缺乏，甚至很可能是帶著意識在避免的。從 1976 到 2014 之間，同樣都是透過藝術及工藝，《神聖的圓》毫不遮掩地建構著國族的意識形態，而《平原印地安人》則是透過歷史框架談論原住民在殖民經驗下的抵抗與生存。

展覽敘事的轉變並非突如其來，這四十年間美國社會經歷過民權運動、1960 年代開始而醞釀至 1970 年代持續發酵的美國印地安人運動(American Indian Movement)、1990 年通過的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暨歸還法案(Native America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2004 國立美洲印地安人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Indian)開館……等事件，都是不容忽視的歷程。其中尤其是 1992 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的五百週年，美國博物館界包括科學、藝術、歷史等領域，都嘗試呈現另一種不同於「慶祝」的觀點。當時美國博物館界意識到 1492 年的爭議性，並試圖提供更敏感也較富同理心的方式，去教育觀眾 1492 年普遍對美洲原住民所代表的負面意義(Simpson, 1996: 40-42)。可見 1992 年博物館界已開始對 1976 年進行反思，而預告了近年的敘事轉變。

三、從「說我們的故事」到「述說歷史眞相」

位於美國華府國家廣場(The National Mall)上的國立美洲印地安人博物

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Indian，簡稱 NMAI），屬於史密森機構(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下的博物館之一，由政府經營。NMAI 在 2004 年盛大開館，當時的核心理念是這麼闡明的：「將策展的權力移交至原住民手中，並讓美洲原住民得以說自己的故事。」(Lonetree, 2012: 83)然而我在 2015 年歲末瀏覽 NMAI 網站時，一個小視窗自動彈跳出來，是 NMAI 向民眾募款的訊息，寫著：「NMAI 需要你的幫助，讓我們得以述說關於原住民歷史與文化的真相！」

圖 3　國立美洲印地安人博物館 2015 年底於官方網站自動彈跳出的募款訊息「NMAI 需要你的幫助，讓我們得以述說關於原住民歷史與文化的真相！」（圖片來源／國立美洲印地安人博物館網站）

我發現了一個細微而有趣的改變——NMAI 的用詞變了，從「說自己的故事」變成「述說真相」。我不禁好奇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樣的改變，也因此從頭檢視美國原住民博物館的發展變化。

回顧美國原住民博物館的發展史，大約起於十九、二十世紀交接之時，美國的博物館開始系統性地蒐集、保存、展示原住民文化。當時這樣的博物館發展與學術研究密不可分，人類學者對原住民文化進行系統性的調查，而

學者們的研究預設、理論、材料、成果等，即體現在這些博物館裡——而它們大多是自然史類的博物館。同一時期，一些富商和有能力遊歷世界的人，也在收藏自己的自然史藏品，其中包括來自遠方充滿異國風情的奇珍異品(Ames, 1992: 50-51; Lonetree, 2012: 15)。

上述不論私人收藏，或與它同時代的自然史博物館館藏，都有著同樣的預設框架與意識形態，體現在收藏取向、分類框架等博物館面向上。它們將原住民文化歸類在自然界中，而認為在工業化與都市化快速擴張之下，原住民，如同自然界中的動植物，是瀕臨危機，有待搶救、紀錄、研究、收藏的對象(Harrison, 2013: 45, 64; Simpson, 1996: 247)。

但這樣的作法在 1950、60 年代開始有了轉變，當時美國民權運動高漲，許多少數族群參與其中。這波民權運動挑戰了社會上長期以來的族群不平等以及種族主義，並促發人們反思在博物館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不對等權力關係，以及博物館員所可能帶有的偏見。因此，19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出現了以單一族群、文化為主題的社區（社群）博物館(community museum)。

社區（社群）博物館被定義為：由該族群、文化的成員所建置、經營的獨立機構，用以詮釋自己的歷史與文化(Simpson, 1996:72)。社區（社群）博物館所強調的自我管理、自我表述，鼓勵了許多美國原住民族建置屬於自己的族群（部落）博物館(tribal museum)。人們期待這些博物館對外能與主流偏頗的他者意象相抗衡，對內能強化自我文化認同，更有甚者能提供就業機會、商業活動(Ibid.: 73, 136)。

而社區博物館發展到 1990 年代前後，又因 1988 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印地安賭博管理法(Indian Gaming Regulatory Act)，及上一章提及的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暨歸還法案的陸續頒布，影響了各族群及部落博物館的運作以及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分別使館舍營運的財源有了新的契機，以及對於歸還文物保存環境的硬體需求。再進一步到 2004 年，美國成立了聯邦等級的原住民博物館 NMAI；博物館學者 Moira Simpson 在開館前夕如此正面描述 NMAI

的意義：

> 雖然它並非社群（社區）自行營運的博物館，而是一座由聯邦政府出資的國家級機構，但它將秉持著族群（部落）博物館的精神，在規劃、執行、研究、詮釋等方面，皆以社群（社區）為出發點及焦點。NMAI 在籌建的最初階段，便在北美地區，與史密森機構的成員、學者、藝術家、教育者、原住民、非原住民……等進行一連串的會議討論，致力於在最初始時即能納入美洲原住民的觀點。為籌建博物館所成立的顧問團，在博物館各層面的工作發揮著效益，展示上亦納入了許多過往被策展人忽略的意見和看法。(Simpson, 1996: 168)

可以看出，社群（社區）博物館的模式如何入主國家博物館，改變國家博物館的面貌。NMAI 雖為國家級博物館，但卻遵循了社群（社區）博 物館的典範，強調合作、共同參與、多元發聲的價值。

然而 NMAI 在 2004 年 9 月開館，隨即引發許多批判和討論(Cobb ed., 2005; Atalay & Lonetree eds., 2006)。加拿大學者 Pauline Wakeham，在參與 NMAI 在 2004 年的開幕活動後，指出 NMAI 在活動裡避而不談任何殖民的不公義，也沒有任何道歉、反省的意味，而直接以充滿歡樂、去政治化的慶祝方式來展演和解(performing reconciliation)。具原住民身份的美國博物館學者 Amy Lonetree，在開館五年後撰文指出，Wakeham 當時對 NMAI「充滿歡樂、去政治化的慶祝」的描述，依然滲透著該機構，並反映在其展示中(Lonetree, 2009: 324)，不論展示或活動，以這種歡慶式的氛圍與論述作結，容易造成觀眾不明所以的感受。

另一方面，在累積了 NMAI 的工作經驗後，Lonetree 逐漸意識到，所謂多元發聲以及權力共享，在執行上的諸多缺陷。當博物館工作者要處理面對具爭議的主題、敏感的話題、衝突的立場，館員通常是將各種觀點並置，並

預設了觀眾皆能不帶任何偏見及立場，中立地接收所有被呈現的資訊，自行進行客觀評斷。然而事實上，原住民的立場卻時常在衝突矛盾的爭論中，在大雜燴般的各種觀點之間，被掩蓋過去，無法彰顯體現在各個故事、事件裡的觀點與智慧。更遑論觀點是如何被博物館員揀選、如何被博物館採用，其代表性與正當性都存在著許多缺陷(Lonetree, 2012: 169-170)。

Lonetree 並非否定 NMAI 的價值，相反地，她同意 NMAI 的建館模式，可說是美國博物館界最富雄心壯志的一場社群合作計畫，徹底反映了自 1970 年代起所發展的趨勢。但僅只於此而不回應殖民，無法名符其實地宣稱自己是去殖民的博物館(Lonetree, 2009: 324)。對 Lonetree 而言，真正的去殖民是陳述殖民的傷痛史實，包括種族屠殺的戰爭、強迫遷移居所、策略性地傳播疾病、同化政策（例如寄宿學校）、土地流失、神聖場域的被迫去神聖化、種族主義、持續的結構性貧窮等(Lonetree, 2012: 5)。Lonetree 於博物館研究上也極力推展這樣的做法，她分析美國原住民社區博物館展覽的案例，特別是 2004 年開館的 Ziibiwing Center of Anishinabe Culture & Lifeways，也引用社工 Maria Yellow Horse Brave Heart 的理論建構展覽敘事的架構並建立論述，說服讀者理解，博物館展覽如何能在陳述傷痛進而成為療癒傷痕的場域。

四、記憶的多向性

揭露傷口，陳述傷痛，進而療癒傷痕，這樣的方式呼應著本文開頭所舉例的《被毯的見證》展覽。不忍猝睹的個人物件、現地殘骸，所揭露的是極為擾動情緒的一段暴力歷史，對加害者或受害者或倖存者任一方來說都是如此；然而展覽最終所呈現的是被毯的形象與象徵，代表的是溫暖、安全與保護——換句話說，策展方終究還是得收拾各方被擾動的情緒，展覽參觀過程才算完整。

這樣的手法，相信對任何參觀過紀念博物館的讀者來說，並不陌生。我們所處的時代充斥了許許多多的紀念形式，包括紀念日、紀念碑、紀念歌曲、

紀念活動等等，以及大量出現的紀念博物館。根據評論者在 2005 年的統計，過去十年之間全世界所成立的紀念博物館，比過去百年間所成立的還多(Williams, 2007: 9)。在美國，由聯邦政府撥款於 1993 年開館的美國猶太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更是造成紀念博物館在數量上急速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Feldman, 2003: 842)，該館的敘事手法——被害者、加害者、倖存者、個人故事、見證、真相、正義、平反、和解等——為世界上其他的傷痛事件，奠定了一種記憶及敘事的框架參照。影響所及，我認為也包括了美國原住民的歷史再現。

1990 年代先後在美國出版的《美洲大屠殺：新世界的征服》(Stannard, 1992)以及《關於種族屠殺的一件事：1492 年至今美洲的大屠殺與否認》(Churchill, 1997)，引起關注並成為暢銷書。要理解當時的脈絡，我認為不可不提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該館在 1993 年開館後，引起了許多美國原住民的抗議，原住民團體抗議國家及社會大眾只記得猶太人經歷的大屠殺，還花費成本地為此成立許多的紀念碑、紀念館來紀念這件事，但卻對美洲本土自己發生的原住民大屠殺一無所知。換句話說，當時在美國引起公眾記憶(public memory)零和競爭的焦慮，不同的群體，尤其是美國原住民，開始爭取、要求他們所經歷的傷痛歷史，能在公眾領域中取得被記憶、被紀念的位置與空間——這即是所謂的關於原住民歷史再現的「大屠殺的美國化」(Holocaust Americanization)(MacDonald, 2007)。

表面上這看起來是記憶零和(zero-sum)競爭的結果，人們看似在競爭記憶，認為公眾記得了甲，就勢必會遺忘乙，故而爭取乙的被記憶。但事實上，美國人並不是因為要記住猶太大屠殺，而忘了美洲原住民大屠殺。相反的，美國人反而是因為記住了猶太大屠殺，而重新理解、重新記憶美洲原住民大屠殺。透過近年新興的記憶研究(memory studies)，我們越來越能理解上述的現象，也就是說，記憶的特質並不像資源一般是零和的，相反地，記憶是多向性的(multidirectionality of memory)(Rothberg, 2009: 6-7)，會觸發其他的記憶——當 1994 年發生盧安達事件的時候，人們會往前參照二戰時所發生的

猶太大屠殺；不只如此，三、四百年前在美洲發生的印地安戰爭與殖民衝突，也會因為我們對猶太大屠殺的記憶，而被重新記憶。

換句話說，透過全球各地對猶太大屠殺的記憶擴散，不僅使它成為全球性的公眾記憶，也透過它觸發了全世界對於其他規模大小不一、歷史脈絡各異的各種屠殺、暴力、違反人權的事件的紀念，甚至回溯，使更久遠以前所發生的歷史，得以重新以紀念化的敘事手法呈現、傳達，進而衍生了紀念化(memorialization)、紀念瘋(memorial mania)(Doss, 2010)等當代社會潮流、現象。

然而，1990 年雖已有原住民經歷美洲大屠殺的論述出現，但新興的研究領域——種族屠殺研究(genocide studies)卻仍主要處理較為近代的事件，多為專制政權下或族群衝突中的悲劇。種族屠殺研究這個領域發展了二十五年後，關於原住民的部分才被邀請進討論圈中。相同地，對於新興的博物館類型——紀念博物館的研究，仍然很大一部份排除了原住民博物館或展覽，人們通常將紀念博物館與原住民博物館視為兩種不同的博物館範疇。

但這樣的現象正在改變，邊界正在鬆動。舉例來說，跨國的學術組織國際種族屠殺學者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nocide Scholars)，每兩年（奇數年）都會選一個地點舉辦研討會，通常都是曾經發生過種族屠殺悲劇的城市或國家。2011 年時他們宣布除了要徵選 2013 和 2015 的地點以外，如果出現極為吸引人的提案，不排除在 2014 年增加辦理。後來 2014 年辦成了，那年的主題是「種族屠殺研究與原住民族」，辦在加拿大 Winnipeg 的 University of Manitoba，並與該年開館的加拿大人權博物館(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結合，在研討會中規劃其中一個場次，討論像加拿大人權博物館這樣的機構，能使用什麼樣的科技或工具，納入原住民的想法與立場，並真實地呈現原住民所經驗的種族屠殺。

五、結語

近年在包括臺灣在內的墾殖民國家，強調真相還原、歷史見證與直視歷史傷痛等陳述詞彙，悄然地由下而上、由個人而機構地流動；從原本只見於原住民行動者、抗爭者及研究者的陳述中，到現在越來越頻繁地出現於機構如博物館展覽、政府單位，甚至當權者的官方文件中。案例零零落落但卻是越來越多，如蔡英文總統在 2016 年 8 月 1 日臺灣原住民族日當天，以國家元首身份所做的演說，其用字遣詞、態度立場等，都是與前例相一致的：

> 臺灣這塊土地，四百年前早有人居住。這些人原本過著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語言、文化、習俗、生活領域。接著，在未經他們同意之下，這塊土地上來了另外一群人。歷史的發展是，後來的這一群人，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讓他們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離失所，成為異鄉人，成為非主流，成為邊緣。一個族群的成功，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其他族群的苦難之上。除非我們不宣稱自己是一個公義的國家，否則這一段歷史必須要正視，真相必須說出來。然後，最重要的，政府必須為這段過去真誠反省。（蔡英文，2016）

而紀念博物館常用的詞彙，如見證、受難者、屠殺、真相、倖存者、傷痛、和解、施暴者、正義、平反……等，如今也越來越頻繁地見於原住民博物館。這樣的現象，我把它解釋為是透過原住民博物館或原住民主題展覽，以爭取觀眾對於原住民族曾經歷的難以面對的過往——所謂的困難遺產——之公眾記憶。我無意像 Lonetree 那樣倡議、鼓吹原住民博物館都應採取這樣的展覽敘事方式：正視傷痛進而療癒傷痛；我的意圖在於證明這個轉變已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並探討此轉變與趨勢從何而來、何以至此。

首先需要認知的是，原住民博物館發展歷程在經歷過多元觀點(multivocality)、權力共享(shared authority)……等源出社群和機構組織的合作模式後，依然遭遇瓶頸。權力分享雖已於博物館界提倡多年，但卻被批評多

數時候在執行面上，特別是對於詮釋權的釋出，仍存在著隱性權力結構以及新殖民主義的可能(Boast, 2011; Krmpotich & Peers, 2014)。因此本文所欲證明的轉變，我認為是為了尋求真正的去殖民所另闢的新途徑。

再者透過記憶研究我們得知，由於記憶多向性的特質，使得全球對於猶太大屠殺的記憶，觸發了人們去重新記憶其他不公義的歷史，包括原住民的在內。加以紀念博物館的蓬勃發展(Williams, 2007)、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陸陸續續將多個困難遺址登錄為世界遺產(Logan & Reeves, 2009)，因而引發原住民歷史再現上一定程度的焦慮與競爭。

另一方面，原住民博物館與紀念博物館，長久以來被視為兩種不同屬性的博物館類型，但我認為它們之間的相似性被低估了，事實上它們兩者的形式、本質、動機、策略，以及在其中流動的情緒……等，都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接近，我們也逐漸在零星但卻越來越多以原住民為主題的特展上，看見兩者展示手法（如敘事、策展等）上的相似。

不過困難遺產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它不只撩撥觀看者的情緒，也二度擾動與召喚被再現者的情感、思緒、記憶，甚至是極力抗拒的汙名或尷尬。一如在《音樂的慰藉》展覽觀眾留言牆上，貼著這麼一則字條：「〈為什麼〉讓人不敢再聽一次」，究竟這是帶著哀傷，抑或恐懼，還是咎責而寫下的心情，我們無從得知。但正因為它都有可能，因此即便在博物館中這樣的敘事策略能正視傷痛進而療癒傷痛，但仍具敏感與爭議。

不過，我認為博物館是一個實踐的場域，它的發展與變動總是回應或反映著時代思潮。透過爬梳博物館發展史我們可以看見，最起初 19 世紀博物館反映了帝國主義與征服，20 世紀上半葉博物館回應國家主義、殖民主義與治理，20 世紀下半葉博物館的去中心化，並從物件導向轉為觀眾導向，回應的則是解殖、民權運動以及各式對權力的反省。以上述這個角度切入來看，無論博物館是主動地回應(respond)或被動地反映(reflect)，它都是被應用來作為實踐某種意識形態或理論或思想的場域、工具；而一體兩面的是，這

代表博物館其實是一個保守的場域，它的發展與變動是總略晚於時代思潮的。因此當 2017 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宣告當年的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在博物館述說難以言說的故事」時，事實上已許多博物館早就已經在說了。同理，當我們理解原住民歷史再現，事實上與我們目前所處的「紀念化時代」潮流密不可分時，原住民博物館及展覽因此朝向了新的發展歷程與階段，是本文所欲提出的論點。

參考資料

Ames, Michael M., 1992. Cannibal Tours and Glass Boxes: The Anthropology of Museum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Atalay, Sonya & Lonetree, Amy, eds., 2006. Special Issue: Decolonizing Archaeology.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30(3/4).

Boast, Robin, 2011. Neocolonial Collaboration: Museum as Contact Zone Revisited. Museum Anthropology 34(1): 56-70.

Cobb, Amanda J., ed., 2005. Special Issue: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29(3/4).

Coe, Ralph T. 1977. Major Exhibition of American Indian Art. Archaeology 30(2): 124-128.

Churchill, Ward, 1997. A Little Matter of Genocide: Holocaust and Denial in the Americas, 1492 to the Present. San Francisco, CA: City Lights.

Doss, Erika Lee, 2010. Memorial Mania: Public Feeling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eldman, Jeffrey D, 2003. One Tragedy in Reference to Another: September 11 and the Obligations of Museum Commemo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5(4): 839-43.

Harrison, Rodney, 2013.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London: Routledge.

Hoare, Irena & Coe, Ralph T., eds., 1977. Sacred Circles: Two Thousand Years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 Art. Kansas City, MO: Nelson Gallery Foundation.

Kibbler, Carrie, 2011. Message Stick: Indigenous Identity in Urban Australia. Sydney: Artbank.

Krmpotich, Cara, & Peers, Laura, 2014. Moments of Encounter. In This Is Our Life: Haida Material Heritage and Changing Museum Practice, 93-158. Vancouver & Toront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Levine, Stuart, 1978. Sacred Circles: Native Americ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Quarterly 30(1): 108-123.

Logan, William, & Reeves, Keir, 2009. 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Dealing with ‘Difficult Heritage.’ New York, NY: Routledge.

Lonetree, Amy, 2009. Museums as Sites of Decolonization: Truth Telling in National and Tribal Museums. In Contesting Knowledge: Museums and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edited by Susan Sleeper-Smith, 322-37. Lincoln, N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Lonetree, Amy, 2012. Decolonizing Museums: Representing Native America in National and Tribal Museums.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acDonald, David, 2007. First Nations, Residential Schools,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Rewriting Indigenous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4): 995-1015.

Rothberg, Michael, 2009. Multidirectional Memory: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in the Age of Decolo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uster, Helen H., 1978. Review of the Exhibition Sacred Circles: 2,000 Years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 Ar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0(1): 193-196.

Simpson, Moira G., 1996. Making Representations: Museums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London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Stannard, David E., 1992. American Holocaust: Columbus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nknown, 1977. Review of the Exhibition Sacred Circles: 2,000 Years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 Art. African Arts 10(2): 78.

Williams, Paul, 2007. 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 New York, NY: Berg.